

海关执法人员客串成“金牌司仪”



蔡上为一对跨国夫妻主持婚礼

在外人眼中,他柔情似水,策划了300多场浪漫婚礼;在妻子眼里,他有点“性格分裂”,生活单调乏味像杯白开水;在同事眼中,他是一名身穿制服的海关执法人员,铁面无私……

蔡上,重庆金牌婚礼主持人。近日,这位“多面人”在第三届全国婚礼主持人大赛上荣获银奖。

老婆身上香水味,助他摘大奖

浅色紧身上衣、深色牛仔褲,一双球鞋……前日,27岁的蔡上给记者的第一印象是:一个阳光大男孩,让人很难与司仪这一职业挂钩,但一副浑厚、磁性的嗓音流露出他的与众不同。

“婚礼是一件神圣的事,它就像一篇散文诗。”谈及大赛获奖,蔡上很兴奋。“第三届全国婚礼主持人大赛于12月8日到12日在宁波举行,是我国婚礼主持人最高级别的赛事。”他

奶,代表激情之后是平静和营养;最后,几种香味和几种饮品混合……蔡上将这一作品取名为“爱的味道”。

蔡上大胆突破现有婚礼依赖声、光的桎梏,运用芬芳和美味,营造出浪漫、唯美的婚礼氛围,从嗅觉和味觉上诠释爱情,得到在场评委一致首肯——他一举摘得大赛银奖和全国优秀婚礼主持人称号,这是重庆男性婚礼主持人获得的国内最高奖项。

新郎吻新娘,他有7种说法

“主持人是婚礼的灵魂人物,但却是永远的配角。”蔡上说,婚礼主持人的文化修养决定了婚礼的格调和气氛。毕竟,对大部分新人来说,一生只有一次婚礼。

蔡上说,每主持一场婚礼,他都要与新人广泛沟通,了解他们的家庭背景、生活背景、感情经历及兴趣爱好等,为他们量身打造串词,而不是按照“规定动作”侃侃而谈。

一次,一位女顾客见蔡上为妹妹主持的婚礼效果好,就邀请他为自己设计婚礼,要求是:因她邀请的宾客跟妹妹的差不多,两姐妹的经历也大同小异,但婚礼要办出不一样的效果。

为此,他花了一天的时间,跟新娘沟通,发现新娘与新郎都喜欢看电影。他就策划了一场电影婚礼:他们事先拍摄了新人相识、恋爱甚至闹矛盾的过程,留下结果未拍。

结婚当天,婚礼现场被布置成一个摄影棚,宾客入场走红地毯,签到台变成签到墙。仪

式开始,首先播放新人先拍摄的影片,接着串词响起:张艺谋用几年时间拍一部电影,他们却用一生拍一部……随着新人缓缓入场,现场顿时变成一片花的海洋,各位宾客手举鲜花变成群众演员……婚礼效果非常好,感动得新娘泪眼涟涟。

“没有充分的准备,主持人就不要登场,这是职业道德。”蔡上坦言,虽然婚礼都是经过彩排的,但是有的新人由于紧张等,还是会出现状况,这就需要主持人临场发挥。一次婚礼仪式中,新郎给新娘戴戒指时,不慎将戒指掉在地上,现场一下冷场,他立即圆场:这枚饱含爱意的戒指沉甸甸……还有一次,新人在点蜡烛时,中间最高一根却怎么也点不燃,他便圆场:爱的道路有坎坷,需要一生用心往下走。

至于仪式上的新郎吻新娘,蔡上就准备了7种说法。文雅版:新郎的吻预示彼此的唯一;浪漫版:甜蜜的吻表达甜蜜的爱;烘托气氛的搞怪版:破儿一个……

浪漫“情圣”,执法铁面无私

一个亲吻就有7种说法,在众人眼里,蔡上可谓浪漫的“情圣”。然而,他的妻子王皎皎却说:“他就一杯白开水,属典型的‘性格分裂型’人。”

王皎皎说,蔡上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,学习的是严谨的法律专业。读大二时,一个偶然机会,蔡上见学校公示栏上贴着一张某婚庆公司招主持人的广告,就抱着玩玩的心态报了名,没想到竟被录取,成了一名

业余婚礼主持人,便经常利用课余时间替别人主持婚礼,同时挣得60元一场的报酬。

大学毕业后,蔡上先供职于深圳海关,一年后调回重庆海关。原以为工作后,他便从此与婚礼主持人绝缘,岂料单位同事知道他曾担任婚礼主持人,结婚时都邀请他客串主持人。一次,在同事婚礼上,一位婚庆公司经理,见蔡上主持得不错,就邀请他担任兼职主持人。

“他把浪漫都给了别人。”王皎皎说,生活中,蔡上不是给人惊喜不断的人。他两结婚时,前后准备只用了5天时间,连婚车都没有……接下来,生活更是“淡如开水”,他把一天分成3个8小时,一个8小时睡觉,一个8小时工作,一个8小时就是他喜爱的主持。“给我这个当老婆的,就没有时间了。”王皎皎说,结婚以来,他们没看过一场电影,没一起旅游过,就连晚上两人一起外出吃一顿情趣晚餐也要盼年盼月。

“他上班时一向不苟言笑,执法铁面无私。”蔡上的同事、朋友田野和张维等证实,工作中,丝毫不看出蔡上在台上的妙语连珠、谈笑风生。

坝坝婚礼,比百万元婚礼浪漫

“什么是浪漫,我觉得真情实感是浪漫,表现为一个幸福的眼神、一个细微的动作,而一切形式上的东西都显得空洞。”蔡上说,自己人行已8年,在学习、工作之余主持了300多场婚礼,经历了重庆婚礼文化由仪式化到五花八门的另类婚礼过程,也主持过动辄

上百万元的奢华婚礼和农家小院里的平民婚宴,还主持过汉服婚礼、韩式婚礼、美女与野兽(新郎扮成野兽)婚礼等另类婚礼及跨国婚礼。但他觉得:婚礼是一首散文诗,任何形而上都显得空洞,回归到真情实感才是根本。

他在深圳曾为一对千万富豪主持了一场奢华婚礼,仅用于烘托气氛的鲜花就耗数万元,加上布置、道具、宴席等,一场婚礼花费上百万元。在重庆金源饭店,他主持了一场豪华婚礼,仅用于铺路的红地毯就耗资上万元。但婚礼过程中,新人或许是太精益求精——彩排了多次,又或许是太追求豪华和形式,甚至采用航模直升机送戒指等。可婚礼进行时,两位新人就像在演戏,缺乏真情实感,来宾也只当是看稀奇,根本提不起兴趣。

相反,在渝北一农家小院,一场坝坝婚礼更让他印象深刻。新娘是一位腿残人士,新郎是当地农民。整场婚礼没有豪华音响,也没有鲜花衬托,更没有高规格来宾,花费不到2000元。婚礼中,新娘见新郎头上有一片礼炮飘落下来的锡纸,竟颤巍巍从轮椅上站起来,吃力地帮新郎挥纸屑……没有事先彩排,也没有预先设计,新娘的一连串动作完全是真情实感的流露,宾客无不感动。

“蔡上确实感悟到了婚礼的真谛,他主持的婚礼投诉率为零。”与蔡上合作的婚庆公司刘经理说,蔡上这种“去形式化”的婚礼很可能是以后婚礼文化的发展方向之一。

据《重庆晚报》

老人自学法律告民警13年打赢官司



付发淑老人

她今年68岁,在她55岁时,有一天,她被民警意外推倒摔伤,生活从此改变。她只有初中文化,为讨说法,她变卖家产,勤学法律,在一次次“不受理”、“不赔偿”的答复下,依然坚持。

2008年9月,在终于拿到法院终审判决时,她又生感慨:官司似乎赢了,可似乎又输了。

12月23日,只有10平方米的房间里,付发淑低头在一本已被旧不堪的《国家赔偿法》上认真做着标记。简陋的房间里,除了高低床和桌子外,就是一摞摞法律书籍。

翻看法律书籍是付发淑十多年来的习惯。让人有点吃惊的是只有初中文化的付发淑对各种法律法规非常熟悉,尤其是对《国家赔偿法》和《劳动法》了解得很透彻。

付发淑说,这两部法律一部和自己的官司有关,另一部和她最近干的工作有关。

付发淑最近的“工作”是免费给讨薪农民工以法律帮助。她说,她想帮助农民工用法维权,而不是以爬塔吊、上闹的方式讨薪。

付发淑学习法律,缘于13年前在她身上发生了一件事。

被推倒在地导致骨折

付发淑是四川绵阳市三台县人,上世纪90年代初,初来新疆的付发淑一无所有,经过一番打拼,她在乌鲁木齐火车站附近拥有了两家餐厅、一个小商店以及一个送煤站,这让周围的人很是羡慕。

1995年7月4日,发生了一件改变付发淑生活现状的事。当天16时,付发淑在餐厅里忙着招呼客人,她的弟弟付友全也在餐厅里帮忙。

付发淑回忆说,当时,店里突然来了七八名男子,其中一个穿紫红色衣服的男子问付友全:“有没有看到一个鼻子上带伤的人来过?”

见对方很急,付友全告诉对方:“来过,在我这儿买了个西瓜吃,那人还说和人打架受了伤,问哪儿有创可贴卖,我告诉他雅西楼有个中医医院,他就走了。”

“我以为是要来问人的,问完就会走,没想到那些人或许觉得弟弟不老实,要把他带到派出所去。”付发淑说,这时她才明白眼前的几个人是民警。

付友全不愿去派出所,因而和民警发生了争执,一旁的付发淑上前阻止,却被一个中等身材、偏胖的小伙子推倒在地,之后,她就坐在地上怎么也起不来了。

没人打理餐厅被迫报停

倒地的付发淑被送到医院,经检查,她的腰四椎压缩性骨折,后经法医鉴定为轻伤,达九级伤残。付友全随后被民警带到派出所,接受完调查得以离开。1995年7月6日,付发淑在家人陪同下住进了乌鲁木齐长江路骨髓炎医院。

住院期间,付发淑寻思让

弟弟先帮她照看生意,可经历此事的弟弟却坚决要离开乌鲁木齐回奇台的家中。出了这事,他们觉得很委屈。付发淑说,生意不能没有人照看,她赶紧打电话回老家找人帮忙。老家的亲朋好友听说付友全在新疆被戴了手铐,也吓得不敢来了,付发淑只得将餐厅店面向工商部门报停,3个月,因为无法走路,付发淑结束了餐厅的生意。

看着辛苦经营起来的小店就这么没了,付发淑心疼得泪盈眼眶。她觉得,事情成了这样,对自己太不公平。出院后,她心有不甘,决定向推倒她的民警及其所在单位讨个说法。

赔偿遭拒诉讼被驳回

1996年年初,身体有所好转后,付发淑多次找到推倒她的民警的单位,但半年过去后,事情没有进展。“不愿意赔偿,我只好向法院起诉。”付发淑说,当时自己认为,只要向法院证实了自己是被谁伤害的,应该很快会有结果。

当年8月,付发淑将民警所在单位行政诉讼到乌鲁木齐头屯河区人民法院,要求赔偿医疗费、误工费、车旅费等费用,共计5万余元。但她的诉讼被法院以“不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”为由驳回。

这让付发淑很意外,由于不太懂法,她对驳回的原因一知半解。“还是先懂懂法律再说吧!”付发淑打定主意后,一边继续找相关部门反映情况,一边恶补法律知识。

之后的4年里,付发淑反复走访公安、法院、检察院等部门,但接到的答复都是“不赔偿”通知书。

这期间,付发淑租住在火车站的一处平房。每天天一亮,她就带上两个馍馍和1瓶水,拄着

拐杖出门到各个单位反映情况,单位下班了,她又去找事发时在场的证人,到了晚上,她就一头钻进书堆里研究法律条款。

由于有伤在身,加之劳累过度,付发淑曾先后3次入院治疗,积蓄也一点点花光了。她靠向朋友借款,甚至将老家的房屋卖掉,筹措生活费,给自己讨说法。

被误为乞丐也坚持打官司

由于去的次数太多,一些单位的人只要见到她,就会以各种理由拒绝她进入。而付发淑的亲朋友纷纷打电话劝她不要再为这件事劳神费力了,但付发淑不听,接着做自己的事。

“时间长了,老家说什么的人都有。有人说我抛下丈夫、孩子跑了,有人说我外面有人了……”有人说付发淑是“吃饱了撑的”,有人说她“精神有问题”,很少有人知道付发淑经历的艰难处境,每天在外奔波,她做梦都想离开这里,回到家乡享天伦之乐。

有一天,付发淑被人“请”了出来,她坐在路边发愣。有一名路人见到她,在她面前扔了1块钱,付发淑一时没反应过来。回过头,她才想明白,人家是把自己当成乞丐了。

13年努力终于打赢官司

时间一晃到了2002年,赔偿依然没有进展。当年9月,经人指点,付发淑来到乌鲁木齐沙区政法委员会找到一名领导。这名领导接待了她,耐心听完她的讲述后,他让付发淑去找案件发生所属地沙区法院立案,不要再继续行政诉讼,而是转诉民警个人。

付发淑说:“没有这位领导,我后来的官司就打不赢,是他告诉我行政诉讼太难打,让我换个思路。”

2003年4月,付发淑以故意伤害罪将推倒她的民警起诉到沙区法院,但被法院驳回起诉,理由是:“此案未经过公安、检察机关做出决定,付发淑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不符合有关法律规定。”

付发淑一边向乌鲁木齐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,一边开始收集证据。不久,乌鲁木齐中级人民法院要求沙区法院对此案进行重新审判。

上诉没有被驳回,让付发淑看到了一丝希望。随后,她得到了乌鲁木齐法律援助中心提供的法律援助,接受指派的新疆百丰律师事务所还专门成立了小组对案件进行分析。

从2003年4月至2006年9月,付发淑又先后5次出庭,法院认可了她的伤情是民警造成的,但认为因为是在民警执行公务中发生的事情,应该提出行政诉讼。于是案件又被驳回,付发淑再上诉……连百丰律师事务所律师李长贵都被付发淑坚持不懈的精神所打动。

2006年12月4日,乌鲁木齐沙区法院重审的结果是:判定民警所在单位赔偿付发淑共计8万多元。十多年的努力终于得到了法院的支持,付发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。

对于这一判决结果,民警所在单位提出上诉,而付发淑也认为自己多年打官司的花费远不止8万元。今年9月,乌鲁木齐中级人民法院做出终审判决,将民警所在单位赔偿付发淑的金额提至14万余元。

虽然现在还没有拿到赔偿,但对于这个等待了13年的结果,付发淑表示满意。

帮农民工讨回工钱

在漫长的打官司之路上,付发淑自学了大量法律知识。她说,自己懂的法律知识越多,

对打赢官司就越有信心。

1999年,付发淑在一次去律师事务所咨询自己案件时,遇到了几位等在门外的农民工,一打听才知道,老板欠薪不给,几位农民工要不到钱,想通过法律途径解决,但他们既不懂法,又没钱请律师。

听完农民工们的遭遇后,付发淑决定为农民工讨薪。为了打赢官司,付发淑回家仔细研究了相关法律,后来为农民工打赢了官司,要回了工钱。

生活中,付发淑非常喜欢看报纸,尤其是法制类新闻。有时看到农民工为讨薪采取爬塔吊、堵路、堵门等极端方式,付发淑就感到很难受,也很失望。

“我非常理解他们的艰难,但爬塔吊、上闹的方式总不是正道,越是艰难,越应该坚持。”她说。

付发淑对社会中存在的出问题就呼吁媒体报道解决,而不采用法律手段解决的现象颇有微词。这一次,记者也是通过朋友,辗转听说了付发淑的事,才找到她进行了采访。

她说,自己打官司期间,也有人提议让她求助媒体,她也动过心,但她却没有这么做,因为她觉得,这些都不能替代法律,甚至是不应该的。

“人为地解决只能解决一些人的问题,只有法律具有普遍意义。”付发淑说,这就是自己为什么帮助农民工打官司的原因,并希望更多人运用法律维权。

“打赢这场官司,我付出了别人难以想象的代价,但终究是赢了。”付发淑说,官司打赢了,冷静下来想想,14万块钱和13年的岁月以及自己所花费的精力相比,又是多么渺小。现在,她只希望对方履行赔偿后,自己能早日回家与亲人团聚。据《都市消费晨报》